责任编辑:王敏 E-mail:applepark99@sina.com

■基本问题研究

# 什么是以人为本?

□王建武 高健生 刘 巩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以人为本这一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念。

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其主要内容包括：

## 基 础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是以人为本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基础的增强，是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讲过：“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就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物质财富的过程，是人获得发展的过程。离开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人的发展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不恰当地强调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绝对意义，庸俗地把人的发展等同于物欲的满足，不仅背离了社会演进的规律，也玷污了人性和人格的尊严。然而，否认物质基础对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也就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条件性。在社会发展中，凭借虚幻的理想和空洞的热情不仅能成正果，而且酿成苦果的教训比比皆是。这样的教训，我们每每追及曾经的历史，都会感到切肤之痛。这就警示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奠定基础。那种把发展社会生产同以人为本对立起来的认识，本身就没有真正搞清楚以人为本的内涵。

## 尺 度

**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以人为本的尺度。**以人为本必须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基本要求有三：一是在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强调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认定和维护，是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二是强调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必须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三是强调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维护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直接体现，只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获得切实保护时，人的尊严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这样三方面的要求，为我们衡量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提供了起码的尺度。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来讨论以人为本，就失去了评价的标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全民主法制，保障人民依法享受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起来的所有实践，从制度安排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尺度。

## 要 求

**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以人为本在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同时，也把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这就是说，社会发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而人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的状况，又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表明，一个国家即便拥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或一定的现代化设备，也不可能自然地使这些资源和设备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样，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也不会自然而然地造成社会的和谐与人的需求的满足。社会文明的演进，除了外在地表现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外，实质上则表现为社会的和谐和人的素质的提高。那种在实践中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物质生产进步，最终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的教训；那种专力于资金、设备引进而疏于人文环境营造和人的素养提高，结果导致欲速不达的结局，都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因此，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如果说物质生产、外在环境的改善是人的发展之“形”的话，那么，人的素质的提高，则是人的发展之“神”，“形神兼备”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无形而神无载，无神则形无帅。

## 保 证

**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是以人为本的保证。**坚持以人为本，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是人的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正是为了这样一种“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中，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虽历经坎坷，但目的就是一个，即改变阻碍人的平等权利的获得和人的价值实现的制度桎梏和社会条件。而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也在于消除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制约人们平等发展，影响他们聪明才智发挥的种种消极因素，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为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更为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围绕这一目的，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仍然需要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 目 的

**依靠人民群众，使最大多数的人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的支配者与享用者，是以人为本的目的。**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一方面要求经济、社会的整个运行与发展，应当始终围绕人来展开，以人为本取代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人与物的统一。另一方面，还必须把“一切为了人 的原则，建立在“一切依靠人”的基础上，既确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理念，也要具有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力量源泉的方法。使人民群众能够平等、公正、有尊严地参与社会实践，支配他们的劳动成果。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以革命的方式，摒弃了资本主义使劳动与劳动成果的获得相分离的状况，并且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理论；进一步阐明了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出深刻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深刻反映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深刻反映当今时代和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发展理念主要解决的是物质文明的问题，执政理念主要解决的是政治文明的问题，价值观念主要解决的是精神文明的问题的话，那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的确是我们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指导思想。



党史札记之七十八



# 两件事忆沙洪

沙洪同志逝世快一年了。友人们张罗给他出一本纪念集，向我约稿。我同沙洪应该算是老朋友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同他在中宣部共事，至今已经半个世纪，理当写点什么。可是，写点什么呢？

我是一九五二年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的四八式（这是我们当时自嘲的称呼）青年学生，沙洪是五三年或五四年（好像是大区撤销的时候）从地方调来中宣部地方工作室的三八式老干部。那时，从地方宣传部门调来不少老干部，许多人都没有安排什么“长”，同我们这些青年一样，都叫“干事”。这风气我很怀念。为什么资历见深就非得安个“长”不可，不安个“长”就不能干事了？当然，都是“干事” 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还是有差别的。在我们这些青年“干事”的心目中，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干部，无论在政治经验上，在工作能力上，在革命资历上，都高出我们许多，我们把他们尊为前辈。没有工作的接触，没有特别的机会，还是无由接近的。后来地方工作室撤销了，科学卫生处一分为二，都扩展了工作范围，沙洪当了体育卫生处的处长，我还在科学处当干事，隔处隔行，依旧没有在哪一件事情上共同工作过。倒是一九六四年一起搞四清，一九六六年后一起关牛棚，有了较多的接触，从这两段时间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沙洪的忠厚为人和正直处世。

一九六四年秋深到一九六五年春暮，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队，到北京郊区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内军庄生产大队搞四清。集中兵力，人海战术，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带队，几十个干部参加，人们说，“半个部长办公会议”的成员都来了。由沙洪担任大队长，我们称他为“沙大队长”。我参加的是这个生产大队的第一小队的四清工作小组。那时指导方针很“左”，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满脑子斗争哲学。我们小队有一户富裕中农，他家的大儿子据说是北京医学院毕业，不服从分配，在家私下行医，私下收受报酬，四清一来，不敢了。仍然有人揭发。这算不算私人开业，“资本主义”行为？要不要为这件事立个“专案”清查？沙大队长派我去调查。我用吃派饭的方式去了这一家，当时派饭只派贫下中农家，到上中农家就很特别了。他家用挂面招待我们，我们谢绝了。用闲谈的方式同他们父子聊家常，他们也明白我们的来意，说：并没有不服从分配，而是没有毕业就休学了，为了照顾生病的老父亲。毕竟学过医，周围乡亲有个小毛病，愿意找他看看，都是义务的，不收人家的钱。我找周围的农民调查，都说他医术还真不赖，不少人生病都找他。有说他收点钱的，有说他收点礼的，钱也不过是几块，礼也不过是几筒挂面，一篮鸡蛋之类。医生私人开业，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但方便群众，又没有什么劣迹，应该怎么处置？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沙大队长。沙洪沉吟了一会儿，说：老父生病可能是借口，不想接受国家分配而想私人开业大概是实情。但是，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开业了 农村有这么个正规学医的也不易，老百姓又需要他，是不是想个什么办法，把他的医学专长用起来？沙洪又亲自找这位医生谈过多次，后来大队就筹办医务室了，请这位医生主持，不向群众收费，由大队给他记工分。一个可能的“专案”，一场可能的“斗争”，就这样化解了 化为为民谋利的一件好事了。

现在看来，这简直不算一回事，私人开业，只要是依法行事，都是允许的和提倡的，又何必框在“大队办，记工分”的框子里？但在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中，不是昏头胀脑去斗“资本主义势力”，而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好事，应该说是有识之举吧。我们那个庞大的四清工作队在村里搞了几个月，现在回想起来，不少事都使我们愧疚。但毕竟有一些事是可以自慰的。卫生处长沙洪办大队医务室是一件，科学处长于光远为公社同农业科技机构挂钩是一件，经济学教授喻明仁（他那时帮助于光远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参加了中宣部四清工作队）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查清乱账，为我们生产小队的会计被迫自诬“贪污玻璃款”一案辨诬，又是一件。

这是我要说的一件事。另一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中。“文化大革命”一来，中宣部被宣布为“阎王殿”，要砸烂。大小“阎王”们（即正副部长们），大小“判官”们（即绝大部分正副处长们），还有一些什么“长”都不是、只是干事较多的“干事”们（我就属于这一类），都给扫进了牛棚。后来，“阎王”们都另有去处，革命群众为便于管理，把余下的牛鬼蛇神们分为两组，一组是处长以上的，沙洪被指定为“召集人”，一组是处长以下的，我被指定为“召集人”。牛棚生活三年，开头是够受的，后来批斗渐少，接受外调日多，棚内气氛日渐宽松，相互交谈也日渐增多，有什么事，几个人之间也可以相互商量了。这时，沙洪找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一件“怪事” 有人动员他站出来造“阎王殿”的反！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沙洪本是个诗人（这一点我到牛棚里才知道）。一九四〇年在山东解放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前夕，他即兴创作了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短诗：“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他的战友久鸣给这首诗配了曲，在沂蒙山区抗大一分校的党的生日庆祝大会上，演唱和教唱了这首歌。由此在解放区传唱开来，又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中，再流传到了北平、南京、上海迎接解放的各界群众中，一时风行新中国。可是，没有多久，销声匿迹，不再传唱了。据说，一九四九年苏联派到中国来参加开国大典的文化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听到群众唱这首歌，认为这曲子是苏联一首列宁挽歌的曲子，庄严的挽歌不宜于欢乐的场合。由此宣传部门就不让再唱这首歌了

曲作者提出过申诉，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一来，中宣部沦为“阎王殿”。这不是天赐的算账的机会吗？有人来找沙洪，要沙洪起来就禁唱这首歌的事向“阎王殿”“造反”。

沙洪经过仔细考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认为，由于苏联人一句话而不让唱一首好歌，曲作者申诉又不予理睬，固然是宣传部门的错误，在正常的气氛下可以提出批评，要求纠正。但是现在打倒“阎王殿”，好多事情是非敌我混淆颠倒，他不愿在这样的时候拿这件事掺合进去凑热闹。他同我们商量，我们都赞成他这种是非分明的正派作风。

为这首歌的错案平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久鸣的来信和冯定给久鸣平反和致歉的复信。冯定是当时华东局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他在信中说，这件事是由北京来人传话，由我和在上海主持宣传工作的几位同志执行的。如此匆忙，主观地轻信人言，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经过这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我更能体会你被诬指的心情。

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总政向全军推荐十二首歌曲，其中就有这首“跟着共产党走”（即“你是灯塔”）。

二十一年后，建党八十周年，不仅在北京的庆祝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在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东高庄此歌的诞生地，立了一块刻着这首歌词和歌曲的花岗石纪念碑。济南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书：《永远的歌声》 介绍这首歌的曲折经历。

有这样一首歌留在人间，留给后世，沙洪同志可以含笑同他的朋友们告别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党史札记，题目就叫《关于“你是灯塔”》，曾经送给沙洪看过。在牛棚中他跟我们讲的故事，也许没有那么详细，得到他的指点，在札记里（包括在这里）写的要准确多了。在那篇札记中，我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从一粒雾珠可以折射一个太阳，从一首歌的命运也可以折射一部党史。 现在，再用这句话，作为这篇记念文章的结尾吧。

■书苑

# 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

□水 石

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贾立臣著的《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一书，对陈独秀著作以及近年来新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在该书602个引注中，共摘引资料原文达二千条以上。正是在这丰富而又可靠的历史档案资料基础上，铺垫出一条陈独秀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

这部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内容上丰富详实，而且敢于触及学术研究的难点和焦点，从而使这部专著实现了利用新资料形成新观点与重新剖析旧资料否定旧观点的统一。应该说这是作者学识水平和研究功力的主要标志之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专著与众不同，它既不是一般传记性著作的花样翻新，也不是仅对某一方面思想理论著作的外延扩展，而是对陈独秀思想的纵向发展（从早年到晚年）和横向延伸（民主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宗教法律以及妇女解放和教育改革等各个方面）相统一的综合研究，清晰地描述出陈独秀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创、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等一生奋斗的三部曲，填补了综合研究陈独秀思想发展史的空白。

在一般的史书中，对毛泽东思想萌芽部分写得都很简略，显得有些苍白，多是孤零零地介绍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使引用瞿秋白和邓中夏的言论也是只言片语，似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无所成就。这不仅仅是陈独秀思想研究中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缺憾。

贾立臣先生的这部专著，对陈独秀关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论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而对陈独秀有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倾向及其历史地位的结论有了全新的理解。特别是对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等问题的分析，不仅一改以往运用形而上学观点批判陈独秀思想的传统习惯，而且还客观公正地解读了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想内涵，例如，陈独秀较早地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认为中国革命性质应该划分为“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两个阶段，更可贵的是他同时认为第一阶段民主主义的争斗是当前“至急切要的工作”，由此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基本战略，并为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另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问题，陈独秀通过理性思考，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实际，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史学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进行历史研究，尤其是进行陈独秀问题的研究，能否根据客观实际，坦诚直言，这不仅仅是水平和胆量的问题，实质上是个史德问题。一个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的结论正确与否，不应该以是否符合某一权威性的论断为标准。贾立臣先生在评价陈独秀的思想观点时，既不是以所谓的“权威”之言为标尺去衡量陈独秀观点的价值，也不是按后来历史的发展变化苛求于当年的陈独秀，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比如，该著作对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论”与毛泽东“两步走论”的分析，改变了学术界惯用的毛泽东与陈独秀“对着干”的思维模式，揭示了陈独秀早在1923年前后既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了国民革命“是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和“开辟共产运动的途径”的观点，从而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所谓“二次革命论”给予了有力的否定，由此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两步走论”是对陈独秀“两个阶段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表现。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贾立臣 著

另外，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问题，作者通过分析新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档案资料，得出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应由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负主要责任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被学术界奉为绝对权威的“内因决定论”进行了重新剖析，提出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责任者”的新观点。

至于该书的不足之处，笔者惟感贾立臣先生在研究陈独秀思想变化的过程中，对于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文件，似乎利用得不够充分。当然，这并不影响作者探寻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的整体构想和基本结论。

国酒茅台 绿色食品
中国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852—2387692 传真：2386057